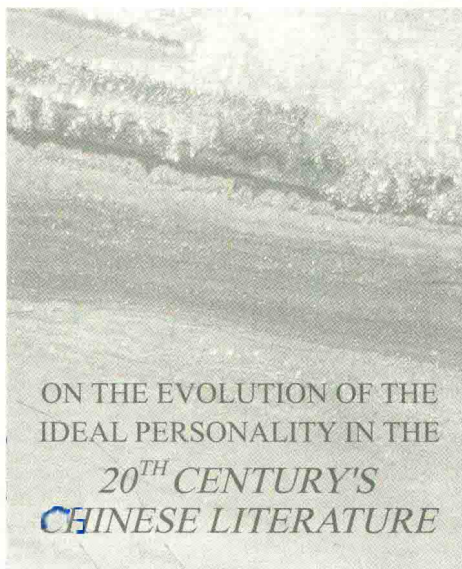


20世纪
中国文学理想人格
流变论

黄传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世纪 中国文学理想人格 流变论

黄传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文学理想人格流变论/黄传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7-5203-4685-6

I. ①2… II. ①黄…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20世纪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36327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艳
责任校对 陈晨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9.75
插页 2
字数 222千字
定价 8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德州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理想人格流变研究”（11DWXJ02）最终成果

目 录

第一章 “新民”:基于群治的晚清理想人格范式·····	(1)
第一节 基于“群治”的“新民”理念·····	(4)
第二节 《黄绣球》:晚清小说理想人格塑造的 实践性文本·····	(22)
第二章 基于“个人”的五四理想人格范式建构·····	(37)
第一节 “个人”:五四文学的主体定位·····	(38)
第二节 多余人心结:五四刚健人格形象的缺失·····	(75)
第三节 娜拉:现代独立女性的自塑或他塑·····	(97)
第三章 基于“大众”立场的革命新人建构·····	(121)
第一节 淹没在大众化叙事中的“大众”·····	(127)
第二节 血色浪漫中的革命新人·····	(141)
第三节 背靠组织的解放区新人·····	(159)
第四章 激情燃烧时代的英雄叙事·····	(179)
第一节 革命历史记忆中的英雄建构·····	(185)

第二节	坚定的社会主义创业者	(200)
第三节	在“英雄”夹缝中的“个人”	(216)
第五章	“余心所善,九死未悔”的新时期理想	
	人格范式	(230)
第一节	劫波度尽 理想仍在的归来者	(237)
第二节	披荆斩棘 正气浩然的开拓者	(255)
第三节	矢志不移 忠于信仰的守卫者	(272)
参考文献	(293)

第一章 “新民”:基于群治的 晚清理想人格范式

对“晚清”一词，学界虽使用较多，但在“晚清”明确的时间指向上却是存在争议的。对“晚清”的起始时间点，各工具书均无明确的义项解释，仅《现代汉语词典》释“晚”时有例子，其第2项释“时间靠后的：～稻/～秋/～年/～清（清朝末年）”^①。但“清朝末年”一词的使用在学界亦不明确。学界不少人持1840年之说，如唐德刚^②、戴鞍钢^③，基于这一时间点的原因是比较明确的，鸦片战争的发生和洋务运动的兴起促使中国不得不开始接受西方。但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来说，1840年之后的中国对西方的接受与学习是阶段性的，是逐步推进的。基于中华帝国悠久的文化传统，近代文人对西方的接受明显经过了由外化到内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人的心理优势逐步消退，以至终于自我主动戴上了“落后”的帽子。从这个角度来讲，1840年并不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349页。

②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8年版。

③ 戴鞍钢：《晚清史》，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版。

是中华帝国一个分裂的重要节点，因为对于一个国家的变革而言，思想的改变才是根本性的。同时，1840 年之说更多是基于史学、政治学解读的成分。

而从文学研究角度来讲，目前论及“晚清”的研究成果不少，有明确认定其起始点的如刘德隆的 1872 年说^①，陈平原的 1898 年说^②，欧阳健的 1902 年说^③。而学界更多对“晚清”的起始点含混处之，如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从其选本来看，其理解当在 1902 年左右，但他并未明确说明，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④在“晚清”的时间认定上则更为模糊。在此，对“晚清”一词的时间界定，我们不妨沿用时萌所言“习用的概念说”，即“二十世纪头十年光景”^⑤，这一说法亦与本书所探讨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想人格形象所设定的时间前限一致。

中国近代以来对西方的学习，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的演化，在此过程中，近代思想家逐步认识到解决中国危机根本性的出路应该是人的问题。人才不足是我们在面对西方时失败的重要原因。“沈沈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才海内空。”（龚自珍《夜作》）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衰败的清王朝竟然无人可用。在人才问题上，作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两位重要人物龚自珍和魏源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己亥杂诗》）龚

① 刘德隆：《1872 年——晚清小说的开端》，《东疆学刊》2003 年第 1 期。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③ 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 页。

④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⑤ 时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1840—1919 小说集 1·导言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 页。

自珍高声疾呼，劝勉统治者要打破旧有的人才格局，选拔出当下所需的人才，但能改变“万马齐喑”局面的人才在当下是否有，龚自珍其实是有所怀疑的，因此才有“天降”一说。龚自珍的人才理念更是寄托于明君的，对于具体的人才内涵及如何培养，他其实是没有细致考虑的。从这一点来讲，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则要务实得多，“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魏源《寰海》），“师夷”的前提是人才的培养，而在具体的人才培养方面，他更强调实践性的一面：“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①只有立足当下，接触现实，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知者”。“病患迭出，人才亦迭出。”^②在当下内忧外患的困局之下，他坚信此时正是出现人才的时机。

龚自珍、魏源的人才说其实是对社会精英的一种期待，而这种期待发展到戊戌变法之后则演变成国民性批判的问题。基于国门被动打开的现实，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全方位地影响到国人，导致“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人生观、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发生混乱和瓦解”^③。此一阶段，对国民性的探讨虽然更多关注国人的现实人格问题，但现实人格的危机却是基于理想人格的定位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新的理想人格范式的建立成为必然。晚清时代，知识分子对新的理想人格的期待更多是基于“国民”这一群体性的概念，认为群治才有国治。在吸收了西方先进理念的基础上，严复、梁启超等人就新的理想的国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梁启

①（清）魏源：《默觚·学篇二》，《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②（清）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序》，《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2页。

③ 马和民、何芳：《“认同危机”、“新民”与“国民性改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教育思想的演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超更是以一部《新民说》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晚清新的理想人格形象的呈现选择了小说这一更为形象、更适合进行立体化展示的文体形式。正如有论者指出：“晚清新小说家对改良‘群治’和‘新民’的执著追求，使小说成为建立理想‘国民’的现代乌托邦的实验场，给社会进步规划出了基本方向和结构草图，这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①晚清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新民”形象，但晚清“新民”说法本身由于是在国家内忧外困的压力之下提出的，这些文学形象多承载了宣扬新思想的功能，有着较强的意识形态特征，而从具体的文本塑造来讲，这些文学形象多说教强于建构，因此晚清小说虽数量众多，但成功地塑造理想人格形象的作品并不多见。在众多的晚清小说文本中，《黄绣球》应该是晚清时代理想人格塑造的一个较为成功的实践性文本。

第一节 基于“群治”的“新民”理念

中华帝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曾长期领先于世界，而在近代却先是遭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后又受制于其廉价商品。国门被打开，我们虽在器物、制度上先后向西方学习，但甲午战争的惨败昭示了洋务运动并不是解决民族危机的根本所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我们的人格危机，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自强图存只会流于空谈。

^① 罗晓静：《“个人”视野中的晚清至五四小说——论现代个人观念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长期以来,儒家传统文化人格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一直占据主导性地位,“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智、仁、勇’三者的统一,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是泛爱人类,智是具有渊博的知识,勇是勇敢坚毅,兼重仁、智、勇,这是一个全面的人格理想”^①。儒家的这种理想人格是最完善的理想人格模式。但在长期的发展中,“它的政治伦理性、内求性和客体性,造成了中国人的奴性人格、封闭人格和依附人格,这些人格是中国人人格现代化发展的障碍因素”^②。理想人格是现实人生的发展诉求,对现实人生应该有一种引领性的作用,因此发展到晚清阶段,传统的理想人格范式发生裂变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倡导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理想人格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

关于“新民”问题,晚清倡导者中理论最为系统化的当数严复和梁启超。

一 严复的三民教育论

1840年后中华帝国意识被逐渐消解,落后意识由点到面越来越被接受,“天下事至今日,其变极矣”^③。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甚至在与西方的比较中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劣势,国人这一阶段面临的问题已不是我们是否需要放下身段的问题,而是西人能否平等对待我们的问题。国力的强弱并不仅仅是生产力的问题,更在于国民的质量。在危机和压迫的体验中,要改变我们落后的局面,要使中华民族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民的素质自然

① 张岱年:《儒家理想人格与现代化》,《书林》1990年第2期。

② 阎世筌:《理想人格理论透视》,《延安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③ 王韬:《弢园文新编》,朱维铮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4页。

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被梁启超赞为“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的严复曾指出，国家的强大在于国民素质的提高。而就国民素质如何提高的问题，他曾基于社会进化论和有机体论系统地提出了三民教育论：“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①

所谓“鼓民力”，是严复基于斯宾塞体育思想，强调体育训练是改变国民“病夫”状况的重要手段。“民力”，可解为“手足体力”，严复将其视为强国之本，“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因为身体与智识是相依相存的，“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通过对古今中外的比较，严复指出中国古人曾有“不忘武事”的优良传统，但在近世这一传统受到一些恶俗的影响而被废弃，其中“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人的手足体力的培养不被重视。而近世西方欧罗巴国则保持着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操练形骸，不遗余力”。面对这种局面，严复提出：第一人们要从事运动以强健体魄，“是以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气体强健者不为功”。第二要有序地摒除鸦片危害，“假令天子亲察二品以上之近臣大吏，必其不染者而后用之，近臣大吏各察其近属，如是而转相察，藩臬察郡守，郡守察州县，州县察佐贰，学臣之察士，将帅之察兵，亦用是术焉，务使所察者，人数至简，以期必周。如是定相坐之法而实力行之，则官兵士子之染祛。官兵士子之染祛，则天下之民知染其毒者必不可以为官兵士子也，则自爱而求进者必不吸食。夫如是，则吸者日少，俟其既

^① 严复：《原强》，见王拭主编《严复集》第一册（诗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以下凡出自本文章的引文不再作注。

少，然后著令禁之，旧染渐去，新染不增，三十年之间可使鸦片之害尽绝于天下”。他主张对鸦片的清除要至上至下，层层监督，假以时日，当能消除这一祸患。第三要解除女性缠足之害。缠足本身是对女性身体的残害，导致女性体质偏弱，而放足则保证了女性身体的天然性，进而能从事相应的体育锻炼及运动。

所谓“开民智”是强调智育，在知识接受上废八股，讲西学，讲实学。严复主张接受西方现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培养实才，进而全面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相较西学，“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致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材，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死板的教育体制使天下学子“尽成奴隶之才”^①。智育中，严复主张首要重视格致之学，自然科学知识强调实用价值，这是国家富强之本。当然，严复亦不轻视社会科学知识，在其《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天演进化论》《思古谈》《读经当积极提倡》《译卫西琴·中国教育议·序》等系列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对社会科学知识也是极为重视的。“民智者，富强之原。”在严复的三民教育论中，智育是最为核心的部分。

所谓“新民德”则是倡导德育。中国封建伦理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套自闭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和道德理念，而严复主张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理念取而代之，培养新的政治体系、新的道德习俗，进而形成新的国民。“至于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三民教育理念中，严复认为这是最难

^① 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诗文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2页。

的，原因其一一是民众长期处于“无教”状态，“至于吾民，则姑亦无论学校已废久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檐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闻有孰教之者也”。教育的等级制，使很多穷人的孩子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因为“无教”，导致民众“后义先利，诈伪奸欺”，以至在关乎民族存亡的甲午海战中出现“水底碰雷与开花弹子，有以铁滓沙泥代火药者”，“吾民以数金锱铢之利，虽使其国破军杀将失地丧师不顾”。道德堕落至于败国境地。其二则是民主与自由的缺乏而导致人心涣散、世风日下，“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通，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因此，要改变国弱之现状，必须“进吾民之德”，培养民众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守信、爱国等品质，戮力同心，共抗外侮。

严复其后的“新民”建设性工作主要是在创作政论散文和翻译作品上，明显地体现出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自始至终都立足于士大夫阶层的精英意识，他寄望于通过大力倡导，依靠有志之士办教育来提高“常民”、改造“群氓”^①。但不可否认的是，严复“对民智、民力、民德的强调，奠定了晚清启蒙主义的基调，也是稍后几年兴起的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前奏”^②。在 20 世纪之初，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严复，不仅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等介绍到中国，更是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将斯宾塞德智体并举的教育思想贯彻到中国

① 惠萍：《严复与近代中国文学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7 页。

②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0 页。

新民建设的理想设计建构中,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人才培养模式。百年来,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主张仍不过时,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仍然是我们强调国民基本素质的重要标准。

二 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设计方案

严复《原强》中对“新民”的培养从教育理念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但对具体的理想人格建设内容而言则远不具体,而完成新民内涵具体阐释的则是梁启超。从1902年始,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了10多万字的《新民说》。这篇文章全面剖析了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和几千年来封建文化沉淀所形成的国人劣根性,根据优胜劣败原理指出新民之必要性,进而就新的国民应该具有的公德意识、国家思想、权利思想等现代公民意识和自由、自尊、进步等现代独立个体意识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其中亦包括了新民的实现途径和方法,是一个真正系统化的“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①。

(一) “新民”的基本内涵

任何一代人都是存在于特定的历史阶段的,都是前代文化的承继者,完全求新求异是不可能的。“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②梁启超的新民观点与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理念是一致的。所谓“新”者,其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前

^① 梁启超:《新民说: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黄坤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梁启超:《新民说》,《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梁启超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以下关于《新民说》的内容均出自本版本,不再作注。

者，是指淬厉国民既有的中华传统文化与道德，把握其优质因子，与时更新，使其不断有新质以保持活力；后者，是指以外来的先进文化作为参照，在比较中查找国民劣根性所在，对照先进文化进行自我修正、提升。

梁启超对“新民”之“新”进一步的解释体现了其世界性的眼光。基于 19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打击之下出现的种种状况，他指出，仅仅“淬厉固有”而自足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当前的世界已不同于过去的世界，现在的国人亦不同于过去的人。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他认识到国人不能仅仅作为“部民”而存在，而应该是同西方一样成为“国民”。国人的“部民”身份导致其“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哲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伦理化的体制使个体过分依赖于群体而存在，独立性丧失。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可取者自然众多，但作为受体而言，盲目接受则是没有出路的。因此，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与时俱进不断自我更新，才不会为时代所弃，成为“新民”。

关于西方国民的特点，邹容曾这样说过：“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① 追求自治、独立，享有参政权，这是一种与奴隶性完全相对立的新人观念。梁启超认为：“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

^① 邹容：《革命军》，收入《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1840—1919 散文集 4》，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49 页。

我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① 唯有这样的“国民”才有独立的思想，才不会满足于曾经的辉煌，才会看到自身的不足，才会居安思危，进而产生“采补”之念。“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气象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者。”不崇洋媚外，不妄自菲薄，亦不墨守成规，这是梁氏所期望的最理想的“新民”。

（二）“新民”的品格

《新民说》中，梁启超首先就各民族国家间的强弱进行了比较，进而以优胜劣败之理分析了不同国民的品格特征以作为“取法”的参照，进而提出以“勘”、“鉴”、“改”、“补”逐次递进的方式培养新的国民。

在理想的“新民”诸种品格中，梁启超首先注重的是群体观念和国家意识。

在创办《新民丛报》时，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② 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方案”中，最先论的也是公德。他认为，公德之心是“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的根基所在。梁启超将道德区分为公德与私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儒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

^①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36年影印版，第56页。

^② 梁启超：《〈新民丛报〉发刊词》，见丁文江、赵丰田主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